不是最好的，但也没有更好的了---台湾淡江大学秋季交流项目

2015-03-19 10:07:44

不是最好的，但也没有更好的了

无意中听到了摇滚师左小诅咒的《太平洋的风》，曲调温暖与怪异相搭，听着略奇怪，歌词倒是不错。查阅之下才后知后觉，原来是左叔改编了韩寒的博文。韩寒台湾之行后的感触化作了左叔歌中吹拂的太平洋的风，也催生了我要写下些什么的念头。我的“台湾情结”萌生于五年前，那时我高一。由于我的高中是台胞捐建的，学校民乐队、合唱团和摄影社得以赴台交流演出一个星期。那七个在台的冬日，我们浩浩荡荡百来号人，乘坐大巴来往于台北、台中、台南的各个学校礼堂，演出之余也在很多著名景点打卡，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。这一段旅程对于十六岁的我而言实在新奇，以至于到了大学，我还想着要回台湾去看看。大三上的淡江大学秋季交流项目是个很好的选择，我如愿回到台湾停留了更久的时间。在这139个日日夜夜里，我看了此生难忘的风光，饱尝心心念念的美食，认识许多热情善良的朋友，拥有了一段纯粹、简单、自在、无忧的时光。就像韩寒在他的博文里写的那样：也许是我的命好，遇见的都是好人，也许是我走的肤浅，几乎所有人都和和气气。毫无疑问，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，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意的一面，也许他硬件不够新，也许他民粹也涌现，也许他民怨从不断，也许他矛盾也不少。没有完美的地方，没有完美的制度，没有完美的文化，在华人的世界里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，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。……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，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。台湾是一个“问题”今年2月，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有一篇文章《原乡台湾》，开篇写道：台湾是什么？台湾是一个“问题”。操着不同语言、不同口音的人们坐船去、坐飞机去，甚至游过去，有的人去了又走，有的人长久停留。谁都想占领，但又没有人能够占领。历史在此纠结地现身，而所谓民国百年，只是这个岛屿崎岖命运里的一小段而已。大陆学生在台湾，更是一个“问题”，处境有时比出国交流的同学还尴尬。我们曾在开学典礼唱“国歌”、向“国旗”三鞠躬时手足无措；不止一个台湾同学会问我：“你是从中国来的吗？”多数时候，我只能笑笑说：“对呀，我从大陆来。”在台北这五个月，我碰上了两次选举。一次是大陆也传得沸沸扬扬的“大陆学生落选台湾淡江大学学生会会长”事件，作为2011年首批赴台读本科的742个大陆学生之一，淡江大众传播系的蔡博艺由于参选学生会会长，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由于陆生的加入，竞选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两种“国旗”以区分学生身份，这自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原定于9月中旬完成的选举也拖到了10月底。最终，因投票率只有2.4%，未达当选门槛15%，会长一职由原学生议会议长庄棋诚代理到2015年5月。另一次选举便是台湾的“九合一”选举（台湾的“地方选举”，选举的内容包括：直辖市长、县长、直辖市议员、县市议员、乡镇市长、乡镇市代表、村里长、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、区长选举）。这次选举颇为关键，被许多台湾民众当作是两年后“总统大选”的风向标，“蓝天变绿地”的结果也引发了大陆和台湾，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热议。由于宿舍楼下就是两个蓝、绿市议员的阵营，9月起至11月28日，各种拉票活动轮番上阵，我们也算真实感受了一回台湾选举的热闹。台湾人对于选举和政治家的态度着实有意思，我想起了吴晓波在《这一代的台北》里写的：2014年台北又选新市长，新一代的年轻选民们不要蓝绿政党任何一方、不要“政治世家”、甚至不要“政治常识”，愣是选出了一个萌头萌脑的外科医生柯文哲，他们对他似乎也不是太感冒，给了个外号叫“柯P”。“是Pro.柯的意思吗？”大陆客问。这回轮到台北人呵呵地笑了，“什么Pro.，就是个P呀”。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 早在上海世博会时期，就见识过台湾的垃圾分类。四年多过去了，上海还是没有普及垃圾分类，个别住宅小区的分类垃圾箱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，而台湾的垃圾分类政策早就实行得顺风顺水。“垃圾不落地”这个简单的环保概念，早就深入每个台北人，甚至台湾人的心中。走在台北的马路上，路两边几乎见不到一只垃圾桶，奇怪的是，连地上也不会有垃圾。我们会选择把垃圾带回寝室丢掉，或者就近请7-11的店员帮我们扔一下。在学校和宿舍，还有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，纸类、塑料、宝特瓶、厨余等等都要分开丢弃，一旦违规丢弃被发现，将面临行政处罚以及义务劳动等。就连我们出去旅游住的民宿中，都会要求客人把垃圾分类丢弃。在台湾分类丢垃圾久了，回到上海，无论什么垃圾都一股脑丢进一个垃圾袋，还真的会不习惯。吴晓波的《这一代的台北》里还举了一个例子，说的是2014年底的台北跨年演唱会：唱场外，“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”101大楼开始表演烟火秀，一百多万人翘首欢呼，跨年时刻，两万三千发烟火如梦如幻，时间总长218秒，“台北市的预算只有这些”。此时，在彼岸的上海，刚刚封顶的、比101大楼还高124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也将发表首次跨年灯光秀，而在外滩，因人潮汹涌发生了悲惨的踩踏事件，死亡36人，最大的36岁，最小的12岁，都是大好的年纪。上海踩踏事件在微信和微博里炸开了锅，而在台北青年人的手机里波澜不惊，他们用的是line和WhatsApp。凌晨两、三点钟，月色朦胧，寒意渐浓，信义区各摩天大楼之间的年轻族群开始三三两两、有序地疏散，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和一只空饮料瓶。台湾的“讲究”还体现在更多细节上。无论是机场、火车站、捷运站还是公交站，台湾人都会非常自觉地排队。一班捷运到达站台，没有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的场景，也不用工作人员在一旁举着喇叭喊“请乘客们先下后上有序乘车”，台湾人都会不慌不忙地等车上的乘客先下车，再依次上车，车上的“博爱座”基本上都会留给需要的人。在台湾，至少是我去过的城市中，都是“车让人”，司机们总是抱着行人优先的态度，在学校中，就算一辆车跟在我身后，司机也不会急着按喇叭催我让道。他们对于资源的节约也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我所就读的淡江大学为学生提供免费打印、复印的服务，但是这些打印设置都自动默认为双面打印，学校还在显眼处放置了废纸回收盒，学生误打或者不需要的纸张可以马上得到回收再利用。我还记得11月初去高雄巨蛋听苏打绿演唱会，场外有粉丝团发放苏打绿演唱会的歌词，在小小的歌词单最后还写着“请不要随意丢弃我哦”。台湾人非常重视“智慧财产权”，也就是大陆说的“知识产权”，学校会不定期举办一些线上有奖答题活动，鼓励学生了解并尊重“智慧财产权”。在淡江，就有交换生因为在网上下载电影而被学校处罚，学生被要求写悔改保证书并做网上测试，还要承担“爱校服务”打扫校区。生活在“小确幸”中 我还记得五年前初到桃园机场，坐着大巴开往台北的一路上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“旧”。整个台湾的面貌其实都算旧，把风吹雨打都写在脸上。即便在台北、高雄、台中这几个都市，也只有少数地区才能看见高楼大厦。台湾的经济起飞在20世纪中后期完成，城市与社区建设也同步进入稳定状态，几十年的老房子用到现在，不足为奇。有人觉得破落，也有人欣赏这种守旧。街区翻新曾进入政治议程，但一般台湾人不以为意，走街串巷，在夜市里摩肩接踵，已经成了习惯。大陆的高竞争压力，形成了大陆的快节奏生活方式。而台湾不同，全台湾人口加起来，大概可以抵一个上海的人口总数，相对而言，他们的生活、生存压力并没有那么大。因此，台湾人并不崇尚“快”，反而什么事情都慢慢来，不急不躁。台湾人确实生活在一种“小确幸”里，过着小老百姓的小日子，不温不火，慢慢说话、好好说话、不呛人；对于金钱，懂得节约又能让自己过得舒坦；对于前途，更多一分随遇而安，很拼命很努力，却又不会把太累太苦挂在嘴边，痛并快乐着。跟他们在一起，整个人都变得很温柔，心情很平静，说话也不再语速快音调高；一起出游会提前买好便当，在一起时不会抱着手机不放而是注重彼此间面对面的交流... 令我意外的是，许多台湾大学生都是贷款上学，也就等于，他们一毕业就背负着十几万台币的债务，这对大陆学生而言无疑是很大的生活成本，而我认识的台湾学生却好像没什么压力。他们没有被上学贷款而压得喘不过气，也不会求父母帮忙还债。台湾学生与大陆学生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，而这不同皆源于各自所处的不同环境。台湾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过就是成为个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人，他们普遍都会对孩子采取“放养”模式。我认识一个台湾叔叔，他等到两个儿子上了大学，自己便辞掉工作考研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。平时，他还会去旁听中文系博士班、大传系、西班牙语系等系所的课程，这个旁听生还比正式学生上课上得认真。他总是背着个书包穿梭于校园中，全然看不出已经五十多岁了。我还在一场讲座中认识了一个台大医学生，他也是台北市长柯P的学生。三十多岁的男生一边学着法医，一边卖摄影器材赚取生活费，他还沉浸在自己的小说写作中，已经出过两本书他的梦想是成为第二个作家“九把刀”。就像左小诅咒所唱的：“也许是我的命好，遇见的都是好人，也许是我走的肤浅，几乎所有人都和和气气。”在这五个月里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台湾人都是热心、真诚、善良的，“谢谢”、“对不起”和笑容常挂嘴边。在台湾，甚至都不用担心会丢东西，我的同学所遗失的雨伞、钱包、手机最终都会被好心人送回来。我见过热情的垦丁，看过美丽的花莲，在野柳吹海风，在淡水看日落，但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还是人，最最舍不得的，还是那股浓浓的人情味。这座岛屿、这趟旅程，不是最好的，但也没有更好的了。